

第 10 卷第 4 期 2017 年 10 月

Vol. 10, No. 4, October, 2017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学生流动趋势.....	129
中国与国际学生流动	131
国际学生是“摇钱树”吗?	133
国际分校——好奇心还是重要发展趋势?	135
21 世纪流动性：国际师资的角色.....	137
重构全球参与	140
美国，欧洲和亚洲：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属机构的多样性.....	142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生健康与肥胖问题.....	145

中欧和俄罗斯的危机

梦之安魂曲：民主制度下的学术自由受到威胁.....	147
乌克兰：地方性高等教育学术腐败.....	149

非洲聚焦：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质量的恶性循环.....	151
发展和构成中的不寻常：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	153
乌干达：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需求.....	155

拉丁美洲问题

创建排名的挑战：以哥伦比亚为例.....	157
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助力经济增长.....	160

国家和地区

东亚高等教育区域化	162
中国：世界毕业率领跑者.....	165
革命后伊朗的政治与大学.....	167

新书速递	169
------------	-----

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学生流动趋势

Rajika Bhandari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科研与评估副院长

电子邮箱: rbhandari@iie.org

全球学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需求稳步增长, 美国接收了来自 200 多个国家的近百万名学生。在过去的几年中, 学生数量大部分的增长是由中国本科生推动的, 这使得美国国际研究生与本科毕业生之间的平衡发生了转变。大规模政府奖学金计划也促进了学生数量的增加, 一些国家的奖学金计划已将其公民送到美国, 主要是学习英语强化训练课程, 或是在 STEM 领域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进行非学历学习。总体来说, 对 STEM 教育的需求依然很高, 美国大多数国际学生选择 STEM 学位, 同时也从 29 个月的 (毕业后) 实践培训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获得益处。在这些总体趋势下, 本文探讨了目前塑造美国 and 全球流动性格局的关键发展。

国家奖学金项目: 发展还是衰亡?

国家奖学金项目继续推动学生流动的增长, 也引发了对国际教育与交流的投资可持续性的重大问题讨论。许多美国院校已依赖于沙特阿拉伯和巴西的学生及其带来的资源, 这些项目的兴衰成败可能会造成一种封闭状态。就美国高等教育部门整体而言, 问题将是如何维持由这些项目发展形成的关系网, 以及如何调整招生策略以弥补巴西和沙特学生人数减少的问题。对于那些现在有大量青年已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派遣国来说,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 这些受过全球培训的人

才将如何被纳入劳务经济? 此类巨大投资的长期影响又会是怎样呢?

全球学生流动: 一些重要问题

性别差距: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派遣国和接收国需要更加努力地缩小国际教育的性别差距, 特别是在某些学习领域。过去三十年来, 来到美国的男、女国际留学生的性别差距已大大缩小, 但在过去两年中又有所扩大。这可能与留学生大多来自于男性主导社会有关,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传统上不鼓励女性出国留学。但这一现象也可以归咎于追求 STEM 领域的国际学生数量增长, 这些领域历来是以男性为主的。重点派遣国政府和院校需要通过其奖学金和交流项目鼓励更多女性出国留学。美国院校, 特别是那些吸引更多 STEM 领域国际学生的院校, 需要考虑如何吸引更多女性国际学生参与其项目。

学术上的流离失所: 从 2015 年开始,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流离失所的规模达到了几代人以来的最高点, 背井离乡者在准备或接受高等教育方面面临挑战。据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估计, 仅在叙利亚就有 10 万名以上的大学生以及多达 2 000 名大学专业人员属于难民, 他们的学业和学术生涯被无限期中断了。2015 年, 联合国登记了 2 130 万难民; 其中一半未满 18 岁且尚未进入高等教育, 而对于许多

人来说，他们的高等教育学习被中断了。所有大学生难民中只有 1% 参加了高等教育，而全球高等教育适龄青少年比例为 34%。学费和旅行成本、身份识别和学术文件的不可用、对以前的研究缺乏认可、语言障碍、承担工作或家庭责任的压力、接收国的歧视以及获取信息的困难都限制了教育机会。尽管院校努力提供财务和应用支持，并努力利用技术来满足流离失所的学生，但需求仍然很大且预计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流动性中的平等和机会：2015 年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使人们重新关注高等教育和国际高等教育中涉及平等和机会的关键问题，以及为各种学生提供全球经历的可行性问题。由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和万事达卡基金会（the Mastercard Foundation）等政府和私人基金会资助的奖学金项目通常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边缘人群提供国际奖学金。研究表明，这些有针对性的努力对于增加获得国际教育的机会有重大影响，对社区和国家可能产生乘数效应。公平交易等式的另一方面是人才外流和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本的损失。世界范围内，虽然在许多大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流出的地区（如亚洲），这一情况已经开始转向“人才循环”，许多在外国接受教育的公民返回祖国，但非洲仍在继续经历由学生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这引起了如下问题：在个人寻求最佳教育的需求和愿望中（无论教育在何地提供），在平衡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以保留其关键人力资本上，国际高等教育部门和行业有什么义务和责任？这种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发展援助形式的奖学金得以缓解，该奖学金由发达国家政府授予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某项具体目标（即 4.b）下进行监管。但根据国际教育协会

近期对全球可获得奖学金数据的分析，这些奖学金总额很小，仅服务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寻求全球教育人口的 1%。

正在改变的政治气候和流动性未来

过去两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被认为是许多传统留学目的地（它们通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学生和学者）的内在转向。第一个这样的发展产物是 2016 年英国的脱欧事件，这可能会对学生进出英国的流动性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流动性产生深远影响。同样，美国的政治变迁以及 2017 年 1 月和 3 月对来自七个国家的个人实行的两次旅行禁令，引发了许多有关美国是否仍将吸引国际学生的问题。

虽然人们对这个问题及其对美国学生流动的影响程度有着诸多猜测，美国大学注册与招生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与国际教育协会、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以及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s Counseling）合作，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2017 年 3 月）显示，在美国 250 所校园中，有 39% 的校园国际学生申请数量下降，特别是中东地区学生的申请下降。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都有所下降。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项调查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内提供了一些急需的信息，但这只是一个基于有限样本的初步结果。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目前的变化激励了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和协会在内的国际教育界，制定联合战略并向外扩展，进一步强调国际教育的价值。通过“这里欢迎你们”（#YouAreWelcomeHere）活动和其他类似的举措，美国院校已开始共同努力，向国际学生强调美国依然欢迎他们。

中国与国际学生流动

高航、Hans de Wit

高航：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t Boston College）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gaohang@mail.bnu.edu.cn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全球知识经济未来的竞争将以人才的可用性为基础。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世界各国在战略上寻求改善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学生。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行动者之一，中国需要改革其现行教育体系的关键方面，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增强文化软实力并巩固国际地位。中国的目标是至 2020 年末接收 50 万名国际学生，且其已朝着这个方向快速迈进，超越了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成为继美国 and 英国后的第三个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国。在主要的国际学生接收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现行的政治气候下，中国成为主要留学目的国的前景比几年前更有希望。吸引国际学生并增加其毕业后留在中国的比例已成为国家主要战略，也成为主要城市、省份、大学的主要战略。但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服务质量。

对中国有何益处？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植根于国内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也植根于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些内外部因素对高等教育系统准备接收更多国际学生的方式有很大影响。

在经济上，可以预见的是，通过学费、

旅费和生活费用的增加，中国将从增加国际学生人数中获益。提高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的比率，加之刺激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政策，可以促进中国作为知识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国际学生可以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做出宝贵贡献。

在文化上，作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桥梁，汉语流利的国际学生将对中国有更好的基本了解，并将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价值传向世界。这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化和学术进入全球舞台的机会，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扩张。

在政治上，国际学生将为中国从全球边缘转移到中心做出贡献。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强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及接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将巩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

在教育上，增加国际学生人数，优化留学条件，促进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之间的沟通，是提高高等教育体系国际化和质量及为中国学生提供“本土国际化”经验的重要举措。

该做什么呢？

新千年开始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招收国

际学生的重要性。综上所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研究中心。2015 年，约有来自 208 个国家的约 39.8 万名国际学生在中国学习，2016 年，这一数字超过了 40 多万。为使这项政策更加有效且持续，应该做些什么呢？

中国需要加强政府间交流与合作的政策。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制定了几项核心政策，其中包括 2010 年发布的《2010-202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National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 fo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2016 年发布的《关于改进新时期教育开放和改革的一些建议》(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Opening and Reform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以及《推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Pushing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ducation Action)。也可以看到有像“丝绸之路大学协会”(Silk Road University Association) 这样的政府间合作项目，通过双边协议，推动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

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是很重要的。为了增加财政援助，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中国在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孔子学院、多边发展倡议和大学等不同层面创造了大量有吸引力的奖学金项目。2014 年，至少有 3.7 万名国际学生获得奖学金。

提升汉语水平是另一个工具。外语能力是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它对学生在中国的教育体验质量有着直接影响，同时中国本国学生也会因语言障碍失去与留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提高国际学生的汉语水平。推出汉语水平考试 HSK，旨在更好地为国际学生服务，并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入学率。

加强和普及全球汉语学习是另一个行动。据官方统计，中国已在 14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11 所孔子学院和 1 073 个孔子课

堂。2016 年，全国孔子学院和课堂招纳了 4.6 万名中外全职和兼职教师，招收了 210 万名学生，共举办了参与人数高达 1 300 多万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国大学为语言能力较差的国际学生提供一至两年的预科教育课程。这项政策对招收国际学生的影响必须进行评估，并与其他政策更好地协调。

未来挑战

虽然近年来中国国际学生人数有了快速增长，但由于国际学生的入学率较低，还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中国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刚刚起步。在国家、地方和院校层面的支持措施仍然不足。以下挑战必须得以解决。

目前的课程太有限，无法满足国际学生的需求。鉴于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是停留较短时间的非学历学生，所以必须开设以其他语言授课的课程，特别是英语授课的课程。

调控学费水平的现有标准是另一个障碍。国家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有专属权制定这些标准，这导致了院校的困境。一些大学希望通过改善服务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增加国际学生的入学率。但是，根据目前严格的学费标准，这些大学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和服务。

大学忽视了外文信息主页、图书馆服务、俱乐部活动和心理咨询等相关服务的发展。为了安全起见及避免可能的冲突，中国大学通常为国际学生提供比国内学生更好的住宿条件。但这限制了两类学生间的日常互动和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培养成熟、多元化的校园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学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渴望抓住中国的就业机会或实习机会。但是，除了北京、上海和广东等较发达地区推出的一些举措外，由于不利的签证、移民和就业政策，这些机会在中国相当有限。

国际学生是“摇钱树”吗？

Rahul Choudaha

DrEducation LLC 与 interEDGE.org 共同创办人、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rahul@DrEducation.com

许多美国高等教育院校面临的预算削减迫使其领导者须寻求其他收入来源，以确保其院校的财务可持续性。在寻求解决方案时，许多人发现了招收国际学生作为资金新来源以资助院校运营并填补预算赤字的机会。

在 2007/2008 至 2015/2016 年间，美国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 67%，达到 1 044 389 人。同时，国际学生为美国校园带来的经济收益增长了 111%，达到 328 亿美元。这清楚地表明，国际学生的经济贡献超过了入学人数的增加。

波士顿咨询集团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制定了一个框架，帮助企业考虑资源配置。它们在框架中使用的术语之一是“摇钱树”。广义上，它表示一个产品或公司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流，以资助其增长并助力于公司其他业务部门的发展。

根据近期我们看到的趋势，有些美国院校把国际学生当成摇钱树吗？它们是否把扩大国际学生入学率放在首位，而缺乏支持这些学生成功发展的相应投入，包括时间、关注度和资源。

增加国际学生人数

预算削减的强度以及用国际学生学费收入取代这些财政削减的机会，共同影响新生进入招生市场。过去十年中，许多院校开始关注通过增加国际学生人数并向这些学生收

取额外的服务费来增加总收入。

然而，许多人意识到增加入学率并不容易，特别是如果院校缺乏全球知名度或是学生们所重视的排名位次不高，或是在其地理位置不具吸引力的情况下。除知名度的制约外，院校也意识到，具备经济条件和学术准备，打算留学海外的学生们有很多选择，这使得该领域竞争激烈。

鉴于许多院校无法向所有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助学金，它们开始意识到如下方案的重要性，即将申请群体扩大到那些可能具备较差学术准备、但有经济支持从而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准备在美国读书的学生中。

较差的学术准备是指学生英文水平或是其它科目的学术表现。为帮助国际学生获得入学英语准备，强化英语课程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s) 成为了重要的支持机制。2007 年至 2015 年间，参加强化英语课程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 145%，高达 133 335 人。

随着强化英语课程的不断发展 (以满足英语准备)，私人第三方机构开始出现，以为英语之外的学术准备提供额外的辅导支持，并提供了获得学会互转的机会。这些提供者还带来了额外的资金以增加招生和相关支持服务。

为了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NAFSA) 委托我开展一项研究，以了解美国第三方参与“直通车项目” (Pathway Program) 的合作情况。调查对象

认为与第三方“直通车项目”提供者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可以使用他们的招生网络。相比之下，不与之合作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失掉学术标准。

尽管对学术标准的丧失表示担忧，但不能忽视许多院校面临的对财务可持续性发展的威胁。第三方提供者的生态系统，与旨在增加入学率的院校合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招生和增加学费是否与促进学生成功的举措相匹配。各院校是否能够支持那些不同学术准备程度及拥有不同学术期望的学生？

对学生成功和校园准备的再投资

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在其《融合国际学生》（*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报告中指出，“尽管（学校）不断加强致力于招收国际学生，但数据并未显示针对这些学生的支持服务有相应的增加。”在美国，最近十年的入学人数显示了许多学校在吸引和支持国际学生上都缺乏准备。

在许多校园，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支持服务主要是根据移民和签证的遵守情况。例如，虽然职业发展是许多国际学生的重要考虑因素，但对于院校而言，这是最次要的。通过继续增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而没有为其成功进行相应的再投资，一些院校在将国际学生视为摇钱树上遭遇灾难。

美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学生中声名远播，

因其具有卓越的品质。只考虑收入，而没有对校园准备和学生体验进行相应投入的院校，不仅损害了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同时也走上了一条只追寻国际学生入学率增长的、不可持续的道路。

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入学模式及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和校园社区相结合的模式，高等教育院校必须加大投入，培训校内教职人员有效地与文化背景各异的学生进行互动与合作。他们必须了解学生需求的多样性，并在改善学生体验和学习结果上不断投入。

在财政拮据的时候要求额外资源是不切实际的。各院校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的方式来重新构思并重新设计策略——在支持学生成功上进行再投资。在我的文章《1999~2020年国际学生流动的三次浪潮》（*Three Wav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1999 - 2020*）中，我认为，那些正在加入招收国际学生超级竞争的院校，不仅来自传统的留学目的地，也来自新的目的地，如中国。这将对院校在分配资源和支持学生成功上具备创新性提出了要求。

总之，虽然对许多院校而言，资金流动挑战是不争的现实，但将国际学生视为摇钱树是不道德的，也有损于美国高等教育来之不易的良好声誉。院校必须创新，以在招生和学生体验及学习结果的再投资中达到平衡。

国际分校——好奇心还是重要发展趋势？

Richard Garrett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richard.garrett@i-graduate.org

国际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已经成为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战略独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高校争相设立“开设店铺”，这些校园在 21 世纪受到了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某些中东和亚洲国家，可预见一些在招生、收入、科研和品牌收益等方面的问题存在。其中一些举动以广为人知的失败而结束，另一些则已发展得相当成功。今天，我们统计到全球共有 249 所分校，这一数字在 2011 年仅为 66 所，据说另约有 20 所分校正在开发之中。

例如，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Tech) 在法国的分校，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RMIT) 在越南的分校以及菲律宾 AMA 国际大学 (the Philippines AM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在巴林的分校等。

真正的国际分校仍然相当罕见，但正不断被建立起来。如果把那些曾经改变状态或是关闭了的国际分校计算在内，其中至少有 42 个记录下来的案例，也就是说，全球一共建立了 291 所国际分校。

什么是国际分校？

2016 年 11 月发布的新报告，将国际分校定义为“一个实体，至少部分由外国教育机构拥有；以外国教育机构名义运作；并提供对整个学术课程的参与，大部分是实地教学，

最后由外国教育机构颁发学位”。

收集关于国际分校的信息相当困难，因为没有政府或非政府实体正式跟踪记录这种活动。很少有国家系统地收集有关高等院校外国活动的资料。通过院校网页、在线文章和新闻稿或是通过电子邮件与院校领导人取得联系，人们尝试收集来自每个现存国际分校的数据。不是每个院校都有现成可用的数据或是愿意分享，有些学校提供的是不完整的数据。更全面和公开的数据将为国际分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诸多好处。我们的数据集反映了迄今为止国际分校格局最全面的图景。

完整的第一部分报告提供了已知的、正在运营和正在开发的国际分校的完整列表，包括成立年份、颁发的学位和开设的课程，以及学生人数等数据。该报告还提供了类型学分析、政府开设国际分校的动因和动机，以及现有的各种质量保证模型。

招生规模？国际分校位于何处？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的跨国教育研究团队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估计，截至 2015 年底，全球约有 18 万名学生就读于本报告定义的国际分校。按绝对价值计算，这是个大数目，但却不及全球 500 万国际学生 (那些在其他国家学习的学生) 的

4%，也仅是全球超过 1.5 亿的高等教育在校生的一个小部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等少数国家，国际分校在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中占很大一部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小众玩家。

总的来说，现在有 33 个“原产地”，也即国际分校的来源国，这一数字在 2011 年初为 28 个。前五大来源国分别是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共有 181 个分校，占全球国际分校总数的 73%。现在有 76 个承办国，2011 年初仅有 69 个。前五位的承办国是中国、阿联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卡塔尔，共同接收了 98 个国际分校，占世界总国际分校数量的 39%。

国际分校重要吗？

开设国际分校的理由包括创收、院校国际化和双向流动、声望以及奠定科研基础等。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分校产生了非正常盈余，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净收入又投入到了学校的运营之中。短期收益很少，并且，不可避免的是，一所国际分校扎稳根基需要很多年，对其影响做出判断也并非朝夕。

国际分校是精英院校所追求的，这些院校将国际分校视为高地位的差异化院校；国际分校也是更不受传统束缚的普通院校所追求的，它们将国际分校的存在视为在新市场中创造新品牌观念的一种方式。

投资国际分校的院校参与一场漫长的竞赛，投资于更全球化的未来，那时，深刻的

国际特色将被用来定义一所大学。今天，绝大多数国际分校仍在重塑这一模式，主要涉及国内学生，且经历着屈指可数的双向流动或单一品牌强化。与过去一样，一些国际分校可能逐渐独立于主办院校，转变为国内大学。一个国际校园网络的附加价值，其总和超过部分，这仍是那些设立国际分校的院校的希望。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国际分校成为院校效能和范围的重要指标，其他院校将难以赶上。一个所有学生都在学习的全球性跨校区网络，或是花费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密切的政府和企业关系，并不能一夜之间复制起来。一些大学正寄希望于小型国际中心来更好地平衡风险和回报。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全球门户模式”（Global Gateways mod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与跨国教育研究团队将继续追踪国际分校现象。事实上，国际分校第二部分的报告将于 2017 年发布，该报告将基于对国际分校领导人的访谈，这些领导人来自至少运作了十年的分校。报告将研究成熟的国际分校的动机和运作，探讨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判断一所分校是否成功的问题，以及何种条件的组合可以带来成功。

注：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与跨境教育研究团队一起发布了一篇有关国际分校的报告。该报告的第一部分可供观察组织成员免费获取，非成员可以付费获得。

21世纪流动性：国际师资的角色

Philip G. Altbach、Maria Yudkevich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科研教授和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altbach@bc.edu

Maria Yudkevich：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副教授、副校长

电子邮箱：2yudkevich@gmail.com

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国外工作的现象已不足为奇。大学本身日益全球化——它们也许是社会所有知名机构中最全球化的地方。尽管国际教师的全球比例很小，但这个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广泛地将国际教师定义为：那些在不在其出生地所在国和/或不在其获得第一个高等学位的国家工作的学术界人士。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其任职学术职务国家的公民。他们是大学国际意识的驱动力，他们往往是顶尖的研究人员，在一些国家，他们占学术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

国际教师似乎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组别的教师是一小部分高知名度的国际教师组，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任职，特别是在主要的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以及英国。他们是全球超级巨星，有的持有诺贝尔奖和其他重要奖项。第二组别的国际教师，基于大学规模、地理位置或特定需求，由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的中等和高等水平大学聘用的高水平国际教师，包括香港、新加坡和瑞士等。

第三组别的国际教师则是在缺乏本地教职人员的国家的大学任教，如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一些非洲国家等。在这里，国际教师经常被聘用来教授低水平课程，他

们通常来自埃及、南亚或其他地区，通常来自非著名大学。与前三名重叠的第四组教师，包括从一国移民到另一国的学者，他们通常在任教国获得公民身份，并被诱惑“回家”。在某些方面，他们可能被认为是“纯粹的”国际教师，但在其他方面则不是。最后一组包括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们也许已经在外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并继续在国外继续其职业生涯，他们可能会被贴上“流动学者”（transient academics）的标签。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一些国际教师。

国际化和国际教师

许多国家和院校把聘用非本土学者作为国际化战略的关键部分。事实上，国际教师往往被视为国际化的先驱。此外，国际教师人数的增加被视为全球排名中国际化的关键标志，也被国家各部委和其他决策者所认可。

人们认为，国际教师将为科研、教学和大学精神带来新的见解。但是，当然，国际教师的贡献效果取决于大学的组织安排、双方对国际化的期望等因素。通常，国际教师没有有效地融入许多大学的国际化课程。他们在其学科领域进行教学，但却无需为大学做别的事情。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国际教师缺乏对当地学术系统和院校规范及政治事

物的熟悉了解，这可能会限制他们参与大学治理和其他大学功能。

在非英语环境教学的国际教师通常是增加英语授课课程和学位课程数量的关键因素，一般对于提升大学英语语言的导向至关重要。许多人把教学和科研中的英语使用视为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与国际教员有关的国家与院校政策

一些国家和大学欢迎国际教师，甚至采取并实施吸引他们的举措。其他国家和大学则不太欢迎。香港地区、新加坡和瑞士大学的目标是在国际市场上雇用约一半的教师，并在排名上表现良好。其他国家，如中国大陆地区和俄罗斯等国，也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和其他奖励措施以招聘国际教师。

不少国家，包括一些有官方文件欢迎国际学者的国家，在招聘国际教职人员的方方面面设置各种障碍。许多国家在获得工作许可证，有关安全和其他问题的程序上，以及有时与特定工作类别有关的数字配额（有时包括学术和研究职位）的签证规定方面有相当复杂的官僚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层面的官僚障碍和其他程序和法律障碍严重损害了国际学术学者的任职，也可能限制可任用人数和类别。

还有反对国际学术任用的国家政策的例子。印度直到最近才停止了禁止向非公民提供永久学术职位的国家法规，因此至今印度大学只有极少的外国教师。加拿大断断续续实行了“加拿大人优先”的招聘政策，据此，大学不得不努力证明每个国际教职并未占用分配给具备资质的加拿大人的职位。然而，一般来说，加拿大一直欢迎国际教师，而且获得公民资格也比较容易。虽然美国在雇用国际学者上相当开放，但在工作许可证和移

民方面的官僚主义障碍常常存在问题，有时是不可逾越的。沙特阿拉伯仅向国际学者提供定期合同。

基于全球化的现实，尽管许多国家为包括教授在内的高素质专业人士开放边界，但规则和条例的实际挑战仍然存在。目前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某些情况下是仇外心理，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为国际学术流动带来更多的问题。

是社区的一部分，还是被孤立的小团体？

考虑吸引国际教师的大学有众多重要的权衡取舍。这些教师应该被聘来教学还是做研究？他们的薪水是否与本地同事所得不同？他们对升职和合同延期的要求是否与国内学者不同？他们是否需要学习国家/当地语言，还是被允许用英语授课？他们应该获得与本土教职人员同样的合同安排吗？

在这些重要问题中，有一个是对学术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国际教师应该深深融入整体大学环境中（承担所有相关成本并享受所有相关的利益），还是应该将其置于一种有着特殊条件，即竞争性的“国际标准”得到保持的“国际少数民族居住区”内呢？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或美国），这个问题不会出现。然而，在许多其他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但却没有明确的答案。国际教师深度融入“普通”大学生活应有助于提高科研和教学文化，使主办院校和当地学术界接触到新的视角，且增加多样性。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与这一过程相关的风险，包括可能出现的国际和地方教师之间的社会紧张关系以及国际学者的较低满意度，例如，由于在许多学术系统占主导地位的不透明的官僚

主义规则。

结语

国际教师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学术环境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国际化的象征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的一部分，国际学者构成了全球学术劳动力的不同组成部分。在最上层，杰出的资深教授被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雇用。在其他地方，许多国际教师是那些本地学者不足的国家中教职员工的必要组成部分。院校和国家聘用国际学者的动机，以及学者为何在国外寻求职位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国际教师是全球学术劳动力不断增长和日益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去到哪里，他们都带来了多样性、新的观点和技能。

注：本文源自《高等教育中的国际教师：比较视野下的招聘、融合及影响》

(*International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Recruitment, Integration, and Impact*, edited by M. Yudkevich, P. G. Altbach, and L. E. Rumbley. Routledge, 2007.)。

重构全球参与

Marijk van der Wende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m.c.vanderwende@uu.nl

重新审视设想和形势

在壁垒建成、边界关闭的时候,高等教育在实现一个公开、民主、公平社会中的作用面临新的挑战。最近的地缘政治事件和激进的民粹主义倾向正在推动对国际主义的反对。对开放边界、多边贸易和合作的支持力度下降,全球化受到批评,民族主义正在逼近。英国脱欧 (Brexit), 欧盟的分裂前景以及美国对世界的背弃, 引起了高等教育在国际合作和学生自由流动、学术、科学知识和思想方面的不确定性浪潮。然而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推出“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 (或称为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 计划等新的全球性举措——可能会涵盖和融合欧亚大陆各地的主要地区, 但中国可能会处于新且不同的环境条件下, 高等教育也亦如此。

这些变化要求对我们关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发展的假设进行批判性的审查。十年前, 我们能想象到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融合可能变得越来越弱吗? 全球化的定义本质上是进步的; 它们提及了世界相互联系的扩大、深化和加速, 国家和地区之间日益相互依存和趋同。但是, 严肃的警告一直存在, 清楚表明了不平等可能出现, 并且全球化不仅产生赢家, 还会导致失败者。

事实上, 十年前,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发布的《高等教育的四种未来形势》(Four Future Scenarios

for Higher Education) 中, 题为“服务当地社区”的提法被认为是改变如下情况的重要推动力, 即“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由于各种原因, 包括最近的恐怖袭击和战争引起的大众对国际化的怀疑态度, 对移民增长的担心, 对外包服务的沮丧感以及认为国家认同受到了全球化和外来影响的威胁等。”此外, 报告提出了政府为地理战略原因推出的雄心勃勃的新军事研究计划, 以及对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研究课题越来越多的安全分类 (OECD 2006, <https://www.oecd.org/edu/eri/38073691.pdf>, p. 5)。虽然这种情况当时并不被视为可能出现的变化方向, 但在十年之后这个情况却正在发生, 包括最近宣布的刺激国防研发的数十亿欧元基金。

在有关贸易、开放边界、移民或难民的公开和政治辩论以及学术界内都可听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国际化的怀疑声。批评声音反对国际化作为一个精英的、世界性的项目, 反对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反对全球排名, 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声誉竞赛 (会有年度失败者和获奖者排行榜), 反对招收国际学生增加院校收入, 反对其他形式的“学术资本主义”。

全球化、不平等与高等教育

诸如经济学领域的托马斯·皮克蒂 (Thomas Piketty) 以及社会学领域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ranco Milanovic) 等学者, 都扩展了我们对全球化矛盾结局的理解。他

们分析说，尽管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全球层面弱化了，这主要是由于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却有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模式体现在高等教育中。

全球不平等的下降是由于中国崛起对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现状的重新平衡效应所造成的，正如其在世界研发支出中的份额及其科研人员的全球比例（这两项都排在第二位，分别次于美国和欧洲）。但由此产生的竞争导致了更多资源集中到了更少数的研究中心，从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导致了欧洲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分层。全球不平等也随着学生人数的全球剧增而减少，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中国和印度。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也面临压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跟随美国的私人捐款模式，而美国国内却对公平和货币贬值的问题强烈批评。高等教育对收入差距负责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可能更重要，特别是在那些已经接近教育参与上限的社会。

全球定位与本土承诺

因此，尽管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有着弱化趋势，但其消减富裕国家日益不平等的潜力，即其任人唯才的作用也受到质疑。由此产生的压力是双重的：在全球层面不断强化的全球竞争以及对当地承诺和服务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追求全球排名位次受到批评，因其损害了大学的国家和地方使命，并将其与社会分离开来，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

学术上流社会。

十年前，可以料到的是，全球化正在造成经济失衡，对社会凝聚力有着不利影响，而且必须重新平衡全球化。大学应该扩大其国际化使命，解决移民和社会排斥问题，变得更具包容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界定其社会契约，即加强少数族裔学生与本土社会的接触，并将多样性作为全球知识社会成功的关键；成为真正的国际和跨文化学习社区，青年人可以有效发展成为全球公民。

通向未来的丝绸之路

虽然一些大学比其他大学做得好，但没有人预料到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在欧洲，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甚至在9/11事件之后国际化的顶峰时期，这也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们对国际化保持乐观态度。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欧盟、美国和中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今年（2017年）3月25日，对《罗马条约》（*the Treaty of Rome*）六十周年的庆祝以对欧洲未来情况的激烈辩论为特点，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比另一些国家更有希望。同时，通过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协议建立中欧合作关系，中国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价值观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我们真的懂得这些价值观吗？我们如何为自己的学生在未来的这些新丝绸之路上的安全旅行做好准备？这是国际化的另一个重大挑战；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从主要或甚至是完全关注西方的情况下展开聚焦，把它展现给新的历史。

美国、欧洲和亚洲：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属机构的多样性

Elisabeth Maria Schlagberger、Lutz Bornmann、Johann Bauer

Elisabeth Maria Schlagberger: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 (Max-Planck-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信息专家

电子邮箱: schlagberger@biochem.mpg.de

Lutz Bornmann: 德国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the Max-Planck Society) 行政总部科学家

电子邮箱: lutz.bornmann@gv.mpg.de

Johann Bauer: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科学家、信息专家

电子邮箱: jbauer@biochem.mpg.de

什么因素能提升大学的声誉? 作为“科研实验室”, 大学、科研机构, 甚至公司都在支持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为他们提供开展研究的可能性。作为回报, 这些机构可能之后会从获奖者的声誉中获利。然而, 大多数时候, 在获奖时,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所在机构并不是其曾开展出色科研工作的机构。因此, 其中哪些机构真正支持了优秀科学, 这是存在争议的。在文献资料中, 上一位专注于 (未来) 诺贝尔奖得主所属科研机构研究的学者是社会学家哈里特·扎克曼 (Harriet Zuckerman), 时间是在 1976 年。她在《科学精英》(*Science Elite*) 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基于 92 为美国“诺贝尔得主”数据的机构排名。《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书是关于 1901 年至 1975 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 (Schlagberger et al. *Scientometrics*, 2016, DOI: 10.1007/s11192-016-2059-2), 我们评估了 1994 年至 2014 年间在化学、物理和生理/医学方面的所有 155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试图确定诺贝尔奖得主在哪些机构中进行了最终获奖的工作。我们的研究基于对获奖者

履历资料的分析。最近, 我们将分析对象扩展到了从 1994 年到 2016 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n = 170$)。

诺奖得主出版物的国家排名

在我们对获奖者与其所在机构完成最终获奖工作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 1994 年至 2016 年, 美国的获奖者数量位居首位 (94.5 人), 其次是英国 (20.5 人), 然后是日本 (12.5 人)。法国和德国的位次相当接近, 分别为 8 位和 6.5 位获奖者。该数字不是整数, 因为如果获奖者隶属于多个国家, 我们会以分数计算。

诺贝尔奖得主在著名科研机构的决定性工作

美国也在机构排名中占据主导, 位居第一, 主要包括: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和新泽西州默里山的 AT&T 贝尔实验室研究所 (AT&T Bell Labs in Murray Hill) (均有 6 人获奖);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5 人获奖) 和洛克菲勒大学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4 人获奖)。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物理学奖得主在 AT&T 贝尔实验室开展了出色的工作。

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是英国, 剑桥医学研究中心 (the Medical Research Centre, Cambridge) (5 人获奖) 和剑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3 人获奖) 是化学和医学/生理学中开展了最多诺贝尔奖决定性工作的机构。英国“诺贝尔”大学有很大的差异, 伯明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爱丁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和曼彻斯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总共有 2 人获奖;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牛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和苏塞克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各有 1 人获奖。

在法国和德国, 著名的科研机构在做出决定性工作时, 都曾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 我们发现, 巴斯德研究所 (the Institut Pasteur), 巴黎大学 (Université de Paris) 和斯特拉斯堡大学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共有两位获奖者, 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和吕埃尔—马尔迈松的法国石油研究所 (Institut Français du Pétrole, Rueil-Malmaison), 分别拥有 1 位获奖者。德国的两所代表性大学是, 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 (the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y of Munich) 和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 (the Albert-Ludwigs-University), 这两所学校共有 1 名获奖者; 代表性非大学科研机构包括: 海德堡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the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in Heidelberg) (2 人获奖),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the Max

Planck Society) (1.5 人获奖) 和作为德国研究中心亥姆霍兹协会 (the Helmholtz Association of German Research Centers) 成员的尤里希研究中心 (the Jülich Research Centre) (1 人获奖)。

在以色列 (共有 4.5 人获奖), 海法技术研究所 (the Techn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 人获奖) 是诺贝尔奖研究的重要机构。诺贝尔奖得主工作的其他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俄罗斯和瑞典; 再往表单下面看, 至少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是: 比利时、中国、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士。

通过专利工作获得获诺贝尔奖

成为精英研究员和诺贝尔奖得主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专利创新。我们发现了至少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如遵循这条路线的工程师杰克·基尔比 (Jack Kilby) (他在 2000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基尔比在德州仪器 (贝尔许可) 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Bell license]) 开发了集成电路, 并在 1959 年注册了一项美国专利, 获得了诺贝尔奖。

东亚获奖者

近年来, 几位获奖者在东亚地区进行了研究。十六年来, 十二名日本人和中国唯一的获奖者屠呦呦在其祖国开展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东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和名古屋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agoya) (共有 3 位获奖者) 以及京都大学 (2 位获奖者) 脱颖而出。内科医生山中伸弥 (Shinya Yamanaka) 在京都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Kyoto) 参与了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 (CREST), 这是日本科学技术局的一项政府项目。微生物学家大村智 (Satoshi Omura) 在北里大学 (Kitasato University) 开展研究,

但却把自己后来的发现，即培养了新的土壤细菌菌株，传送到了美国新泽西州肯尼沃斯的一家名为默沙东研究实验室（Merck Sharp & Dohme）的公司。

培养博士的精英大学支持未来“诺贝尔得主”

不足为奇的是，在那些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们曾经获得博士或医学博士学位的机构名单中，大多数美国院校和科研机构位居前列：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4 人获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8 人获奖）和麻省理工学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6 人获奖）排名第一。在英国，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及剑桥医学研究中心（the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Cambridge）排在首位，共有 7.5 人获奖。一些精英大学选择和/或培养了五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美国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英国的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日本的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

没有博士学位的诺贝尔奖得主

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没有博士学位。除了基尔比和屠呦呦外，比利时“诺贝尔得主”伊夫·查文（Yves Chauvin）只有化学工程本科学历。他写道，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时候都对此感到遗憾。诺贝尔物理学家田中耕一（Koichi Tanaka）在去岛津公司（Shimadzu Corporation）工作前，只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并获得了工程学位，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京都的科技工业仪器公司。

结语

总的来说，我们的结果显示，诺贝尔奖得主大多从属于精英机构。他们大都接受了出色的大学教育，在著名的科研机构中开展了决定性的工作，并在获得诺贝尔奖时从属于优秀机构或大学。未来将会告诉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将更多在美国境内外较小和不知名的机构接收教育和工作。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生健康与肥胖问题

Caitríona Taylor

美国波士顿学院体育副指导员

电子邮箱: caitriona.taylor@bc.edu

全球肥胖率正在快速上升。世界卫生组织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报告称, 自 1980 年以来, 全球肥胖率已增长了一倍多。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高热量食物的消耗增加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过去 20 年的肥胖率已增长了三倍。肥胖、超重及相应的疾病占据了全球死亡率的 5%。

目前, 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重点是对抗肥胖症惊人的快速增长。世界卫生组织 2004 年 5 月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饮食、体育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WHO 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在 2017 年 2 月 8 日的一次讲话中,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Margaret Chan) 博士指出, 尽管饥饿仍是全球性问题, 但在过去的十年里, “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变胖了”。

这是每各人都面临的问题, 不论其教育程度或收入水平如何。但是, 对于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 这一问题特别明显, 因为他们负责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年轻人。此外, 这些机构拥有资源和设施, 可以用来开发那些促进和提升健康文化的方案。

在北美, 教育与收入呈正相关, (教育程度越高) 肥胖减少; 数据显示, 接收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不太可能出现超重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报告显示, 在其成员国中, 识字率较高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成年人认为其身体健康水平

比文盲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高出 33%。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 年轻一代正经历着肥胖率的快速增长, 他们都是新兴和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在《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4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 涵盖了低收入、中等收入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 22 所大学的 15 766 名本科生, 研究人员发现, 平均而言, 样本人口的 22% 是超重或肥胖。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经济前景, 但这些机构也要对以下趋势负责, 即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未带来肥胖率的降低。

以埃及为例

根据 2010 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70% 的埃及人超重或肥胖, 这一比例在非洲是最高的。埃及肥胖率最高的人群是受过教育和富有的人。因此, 埃及是一个适合案例研究的发展中国家。

埃及政府本身就意识到这种日益严重的“流行病症”。卫生和人口部在 2015 年进行了“埃及卫生问题调查”(Egypt Health Issues Survey), 以了解人口中健康问题的程度。结果令人惊讶。在 15~59 岁年龄段中, 女性超重或肥胖率为 76%, 男性为 60.7%。与欧洲和美国相反, 在埃及, 高等教育不能“抵御”肥胖。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埃及男性, 肥胖

或超重的比例为 60.9%，而完成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比例则为 68.2%。没有受过教育的埃及妇女肥胖率达 83.1%，但完成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数仍然是令人不安的 77.3%，这也是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埃及，随着财富的增加，超重或肥胖的人数也会上升。如果将财富等级分为四级，将最低等级与最高等级的人进行比较时，男性的比例分别从 51.9% 上升至 67.8%，女性的比例分别从 70.9% 上升到 78.4%。埃及正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机会，目的是在 2021~2022 年间将入学人数从 32% 提高到 40%，且入学率的增长主要出现在收费的私立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私立大学，将招收那些最容易超重或肥胖的人，即受过教育和富有的人。

埃及目前的体育活动举措

缺乏体育活动是超重和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埃及大学已经意识到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开罗大学 (Cairo University) 是该国的旗舰大学，它将体育运动包含在其学生活动使命之中。私立的美国大学开罗分校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将西方体育与娱乐体系纳入其教育途径之中。适当设施的可用性及谨慎使用是增加学生体育活动机会

策略的核心。

然而，与西方大学相比，可用资源的使用时间有限。大学需要制定计划来增加其设施的使用。本科生对美国大学开罗分校健身设施的使用率非常低，只有 10%。如果在这样一所埃及精英私立大学即美国大学开罗分校都是这样的话，可以得出结论，埃及的其他私立和公立院校的体育活动参与水平与其相似甚至更低。相比之下，在北美，75% 的学生使用校内娱乐设施和项目。如果埃及大学可以增加使用小时数并开发具体的体育活动和健康教育计划，那么它们将增加学生的体育活动，并解决引发肥胖的主要问题之一。

结语

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水平与较低的超重和肥胖水平间呈现正相关。这种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遇到相反的情况，所以对这些国家的大学来说，重要的是使健康成为其院校使命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大努力，增加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参与，这是解决肥胖危机的关键，且它只能通过教育和参与体育运动来阻止和扭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和教育水平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此外，如果教育机构不优先考虑学生的健康，其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将继续下降。

梦之安魂曲：民主制度下的学术自由受到威胁

Daniela Crăciun、Georgiana Mihut

Daniela Crăciun：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博士生

电子邮箱：Craciun_Daniela@phd.ceu.edu

Georgiana Mihut：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高等教育博士生

电子邮箱：mihut@bc.edu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价值和治理原则。它深深扎根于科研和教学之中——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最近，民主政府对学术活动和高等教育机构采取了一些报复行动。

学术自由和民主政府

在波兰，安德烈·杜达（Andrzej Duda）总统正威胁剥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高级国家奖章，因为他的工作揭露了波兰人参与大屠杀。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当选的右翼政府提议立法，对把纳粹或斯大林主义罪行归咎于波兰的任何人施加五年有期徒刑。匈牙利快速追查了《国家高等教育 2011 年 CCIV 法令》（*Act CCIV of 2011 on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立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旨在规范 28 个在该国发挥作用的国际大学。但是，正如观察员所指出的那样，它专门针对一个不受传统工具影响的国际高等教育机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所以，该法案被称为“Lex CEU”，中欧大学在重建中欧和东欧民主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推行了“开放社会”的理想。

政府常像对待政治反对派一样对待大学。自成立以来，大学培养了批判性思维、辩论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状的反思。传统上，民主政府认为大学是重要且有价值的对手，

在任何健康民主的“新陈代谢”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民主政府则认为大学是威胁，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即，削弱学术自由、减少院校自主权、削减资金、关闭大学）来引导其活动。然而，最近在那些被认为是民主地区的政府已开始把大学视为威胁。匈牙利最近的立法改革就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例子。

匈牙利的近期发展

立法直接威胁到匈牙利大学的存在。它要求中欧大学在美国纽约州建立一个分校（所有课程均注册，但学校并未运行），使中欧大学不再向毕业生颁发美国学位（即使其所有课程都是由美国中部各州高等教育审议委员会 [the 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认证），它要求欧盟以外的中欧大学教师具备经由匈牙利政府审核的工作许可证（这些教师目前不需要经过这些程序），并阻止中欧大学在其现有名称下的运作。

匈牙利政府认为，修正案旨在规范跨境高等教育计划，以确保质量。然而，考虑到立法不成比例地针对中欧大学，它是一所在全球顶尖大学排名第 39 位（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的大学，这一理由是适用的。这些不是质量保证措施，而是旨

在使政府直接控制国际教育的行政措施，以前不能通过传统方法（即通过削减公共补贴）来影响国际教育。

学术自由遭到的不断攻击

这项立法修正案是针对该国学术自由的最新政策措施。以前，匈牙利政府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以减少公立大学在该国的影响力。2014 年，国家高等教育法的另一项修正案让总理有权在公立大学任命具有财务执行责任的名誉校长。因此，学校校长的权力已被降级至学术领域。这一安排得到了 2015 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的强化，该修正案将中长期目标的战略规划委托给主要由国家政府代表组成的大学层面的咨询机构。这些修正案的官方依据是提高公立大学的效率。但是，这些政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院校自主权，并允许政府直接控制大学的运作。

非自由国家的学术自由

十年前，这些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在 1989 年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匈牙利已经相对迅速且成功地向民主过渡，成为第一个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东部集团国家之一。2014 年，在加入欧盟十年后，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总理宣布，为了保护匈牙利的国家主权，他计划放弃自由民主，以建立以俄罗斯和土耳其现实为模型的“非自由国家”。根据衡量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质量等指标的经济

学人智库民主指数（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Democracy Index），自 2011 年以来，匈牙利已成为了更为明显的“缺陷型民主”。

俄罗斯和土耳其发生了严重的学术自由袭击事件。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欧洲大学（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在政治家维塔利·米洛诺夫（Vitaly Milonov）提出投诉后，被撤销了教育许可证，这引发了监管机构的 11 次突击检查，发现了 120 项许可证违规行为，其中只有一项尚未得到解决。顺便说一下，维塔利·米洛诺夫是禁止“同志宣传”臭名昭著法律的制定者，而圣彼得堡欧洲大学是该国最大的性别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在土耳其，受难学者机构（Scholars at Risk）称，由于被怀疑参与了 2016 年以失败告终的政变，近 6 000 名学术和行政人员被当局从大学中解雇。

结语

对民主国家学术自由的攻击既是民主衰落强有力的象征，也是其后果。保护学术自由是包容性和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社会工具。诸如匈牙利等国亲眼目睹了独裁政权的毁灭性后果。自由教学与自由科研确保历史不被遗忘，也确保了有效民主所需的相互制衡得以维持。学术自由不仅对大学的福利至关重要，对大学所处国家和地区的福利也很重要。

乌克兰：地方性高等教育学术腐败

Elena Denisova-Schmidt、Yaroslav Prytula

Elena Denisova-Schmidt: 瑞士圣加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讲师、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 elena.denisova-schmidt@unisg.ch

Yaroslav Prytula: 乌克兰天主教大学 (the Ukrainian Catholic University) 应用科学学院 (the Faculty of Applied Sciences) 院长

电子邮箱: ya.prytula@ucu.edu.ua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伦敦时报》(the Times of London) 最近的文章敲响了警钟: 美国和英国大学录取的国际学生比其国内学生作弊更频繁。为什么会这样呢? 把乌克兰高等教育作为地方性腐败学术环境的一个例子, 我们试图通过探索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些决定因素来回答这个问题, 并呈现更可能进行货币或非货币腐败行为的学生群体的看法。我们的调查结果可能有助于接受国际学生的美国和欧洲大学调整其在学术诚信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为何选择乌克兰为例?

在乌克兰, 与大多数后苏联国家一样, 高等教育的腐败也不例外, 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依据“透明度国际腐败认知指数”(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乌克兰在全球 15 个后苏联国家中排名很低。乌克兰的公共机构都遭受着腐败的侵袭。根据欧洲科研协会 (the European Research Association) 在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1 年进行的调查, 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在 2015 年进行的调查显示, 教育、医疗保健和警察部门是腐败最严重的领域。

利沃夫的作弊学生

我们最近在利沃夫公立大学的 600 名学生中进行了一项代表性研究, 利沃夫是该国腐败最少的城市之一。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各种涉及学生的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腐败。47.8% 的学生有行贿经历; 94.5% 的学生承认他们在考试和测试中作弊; 92.8% 的学生通过复制和粘贴文本撰写论文, 不注明文献来源; 64.2% 的学生从互联网下载文章, 并将其作为自有成果提交; 40.4% 的学生向“写手”购买论文; 37.5% 的学生要求教师给予优待。他们的作弊频率不一, 包括“很少”、“有时”, “经常”或“系统地”, 但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在作弊。这是为什么呢? 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作弊可能是学生拥有兼职工作的必需品, 因为学生(要打工)没有时间学习和/或上课(乌克兰大学的课堂出勤是必须的)。这可能与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的科目相关。一些学生确认了这种想法, 即他们把获得大学学位当作一纸凭证, 而不考虑获得方式。良好的分数对于获得国家奖学金也很重要: 这可能是贿赂教师的另一个原因。

谁作弊更多呢?

一些学生群体比其他学生更易于使用各

种作弊技巧。其中一类是住在宿舍的学生。这些学生或许最为了解可能利用的作弊工具，而教师们都准备忽略和/或接受这种行为。与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学生相比，这些学生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购物、烹饪和清洁。因此，他们的学习时间更少。而且，在乌克兰的宿舍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拥有独立生活和学习的私密空间。例如，将学生的生活条件提高到美国大学宿舍的水平，美国大学为学生提供食物，或为学生创造更多在大学学习的空间，这或许是可能的补救措施。作弊学生通常来自中等教育水准不足的小城镇和农村，这些学校教师数量不足、教师工资不足或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投资改善小城镇学校，使中等学校的教学更具吸引力，可能是减轻腐败的其他途径。最近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表明，即便考虑到社会经济特征，那些就读于教师具备积极性和支持性学校的学生，通常更加积极，也能在某些科目上也取得更好的成绩。

更可能利用各种作弊技术的第二类学生是不完成作业的学生。他们中的有些人需要工作才能支付生活费用，因为他们无法从家庭和/或国家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如果他们得到额外的财政支持，这可能会减少腐败。那些不投入个人努力学习（即通过完成家庭作业或是进行课外阅读来学习）的学生用作弊来弥补其不付出。因此，培养学术参与文

化也有助于减轻腐败。

第三类学生是进入大学之前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以及在大学学习中成绩不佳的学生。这些学生常认为大学学习是获得正式文凭而非接受教育的途径，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逻辑后果之一。提升职业培训体系并使其具有吸引力，例如，德国职业培训体系的模式就把入学和就业结合起来，这可能是减轻腐败的一种选择。

我们并未在参与非政府组织（我们对社会行动主义的衡量）、教育资助类型（国家补助或自费）或学生的（家庭）财富与学术不诚实的类型间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然而，我们对反腐败干预措施对学生影响的调查显示，这些举措可能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即通过使年轻人相信作弊行为广泛存在和/或向他们介绍新的作弊技术，滋生腐败和学术不诚实。了解腐败的传播可能会增加其接受度。

可以做些什么呢？

尽管在地方性的腐败环境中消除腐败几乎不可能，但减轻腐败是有可能的。然而，反腐败政策应该足够巧妙，不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规定对腐败零容忍的反腐败政策，针对特定群体的需求，从长远角度体现学术不诚实的负面影响，如对人类生命的直接和间接损害，这些做法或许更易取得成功。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质量的恶性循环

Ayenachew A. Woldegiyorgis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博士生、研究生助理

电子邮箱: woldegiy@bc.edu

背景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部门在过去 15 年来一直在迅速扩张。在这个时期,公立大学的数量从两所增加到了 35 所(其中两所是科技大学),而私立大学只有三所,本科生人数已从三万多猛增至 729 028 人(在 2014~2015 学年),毛入学率达 10.2%。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该国的发展和转型计划第二阶段(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中建设 11 所新的公立大学。这是一项带来诸多影响的大事业,特别体现在对合格教学人员的迫切需要。

为使计划建设的大学拥有足够数量的合格教学人员,教育部邀请毕业于本科项目的学生在 2014~2015 学年结束时参加资格考试。那些成功通过考试的考生(就每个专业情况而言)可以被聘用为各自领域的研究生助理(graduate assistant)级别的大学教师。

尽管这一程序比起前几年根据成绩和英语水平聘用研究生助理的做法有所改善,但结果却不尽人意:绝大多数候选人未能通过考试。这些结果表明,埃塞俄比亚在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相当严重:即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

数据所呈现出的信息

快速浏览上述举措中的一些数据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结果和令人担忧的观察信息。全

国 32 所大学毕业的近 10 000 名学生参加了集中制定的考试,涉及 14 个学习领域。合格标准是基于考生的就职兴趣及其累计平均绩点(GPA)的最低要求,男性为 2.75,女性为 2.5。最终,选出了 716 名候选人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其中 30%是女性,这与在第五个“教育发展计划”(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结束时(2020 年),将女性学术人员的比例提高到 25%的目标基本相符。

虽然最高分是 100 分,但只有一人得分超过 80(确切说来是 81 分),其次是 28 名得分在 70 和 79 之间的候选人。总体平均得分为 57.8,性别差异不显著(男性平均分为 59.3 分,女性为 54.3 分)。

比如说,一个人的专业得分为 57.8,最多被视为表现平平。令人不安的是,127 名选定的候选人(或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得分不佳(根据该国的教育政策,少于 50%的分数意味着不及格)。在这方面,性别差距很大:男性占比为 12.9%,女性为 29.7%。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各领域最高得分者的小样本结果,仅占参考人数的 7%。可以想象其余 93%的参考者的结果,对于那些成绩在及格边缘的人来说,要在考试中一次性合格,那就更糟糕了。

这些都是令人痛心的数字。不仅新一代大学教师的平均成绩相当平庸,且相当一部分人在自己专业课程的资格考试中不及格。

这使他们的教学技能和在学生心目中的榜样地位受到了影响。

质量危机

低素质的大学教师是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低质量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埃塞俄比亚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从而学生们在大学教育上准备不足。该国“第五个教育发展计划”（Fifth 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称，“许多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其成绩低于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及格门槛（50/100分）。”《第五个教育发展计划》进一步指出，低质量教学与无准备学生的结合可能是本科生毕业率低的原因。对政府来说，一方面要做这样的评估，另一方面却要雇用那些学术成绩很差的大学教师，这似乎完全是自我毁灭性的。

这个问题在某些学科更加严重。例如，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考生平均成绩分别为 48.3 分和 50.5 分。这些学科的低分是特别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些科目被认为是该国重点学术领域，如工程、科学和技术的基础。

这对科研能力也有影响。自 2011~2012 年以来，科研只占全部大学总预算的 1%，其中大部分科研主要由研究生进行。鉴于毕业生的素质以及入读研究生课程的人员，埃塞俄比亚大学的科研能力遭到严重破坏。

能做些什么呢？

埃塞俄比亚大学教育、毕业生及其科研

基础设施较差的质量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发展议程构成了真正的威胁。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

作为一个快速解决方案，需要对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安排以参与教学，或许是与刚毕业的助理人员合作；建立指导方案，资深员工可以对新同事进行培训并提高其能力；创造更好的薪酬福利计划，吸引更多合格的专业人士来到教学领域；更好地利用侨居海外的埃塞俄比亚专业人员；并且，尽管存在缺点，在某些重要领域使用外籍人士。

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是放慢扩张速度，注重发展现有院校，特别强调在整个系统中创造差异化。具体来说，通过降低新高校建立率，优秀的老牌院校必须自我提升成为研究型大学，并获得相应的资源。这些院校可以进行高水平的学术和科研工作，这带来了两个主要的好处。

首先，它们将成为知识创造和转移以及科技进步的中心。这为农业和工业等重点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需要的知识供应。第二，作为学术进步的中心，它们将有能力为新建立的大学战略性地培养训练有素、合格的学术人员，并提升现有大学的能力。

现在，是时候更加认真对待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避免即将到来的危机。否则，埃塞俄比亚增加高等教育机会的宏伟计划将带来一批比现有大学质量更差的大学。

发展和构成中的不寻常：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

Wondwosen Tamrat、Daniel Levy

Wondwosen Tamrat：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St. Mary's University）副教授、创始人之一

电子邮箱：preswond@smuc.edu.et

Daniel Levy：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教育政策与领导系特聘教授

电子邮箱：dlevy@albany.edu

背景

2016 年，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为 11 万名，其规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一数二。尽管埃塞俄比亚的私立高等教育萌芽较晚，且存在一些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但其私立高等教育规模仍然庞大。

特定国家的专家和舆论普遍持有一种夸张态度，认为它们的制度是非典型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夸大了其制度的非典型性。但是，审查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合理结论是，从根本上说，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确实是非常不典型的。在了解几个并非微不足道的共同点后，我们将会研究更明显的差异。

尽管绝对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率很高，但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所占份额只有 14%~17%，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是相当典型的。此外，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的类型遍布整个地区。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块是非精英型的高等教育，是需求吸收与（更多则为）有效劳动力市场导向的组合。半精英型院校和宗教型院校也是存在的。少数半精英型大学与优秀的公立大学竞争，特别是在教学和其他领域，主要“受益”于这些公立大学的混乱无序。此外，正如该地区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私立高等教育绝大多数

学习领域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但最近在其他领域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女性在私立大学中的比例高于公立大学。各种形式的社区参与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在该地区，尽管私立院校的总入学人数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公立院校的入学人数也在快速增长，所以，私立院校在入学人数上所占的份额最近也有所下滑。

尽管有类似之处，但非典型特征更为显著。其中一种不寻常的特征主要是在增长和监管部分；而另一种不寻常特征主要涉及私立院校的内部构成。

非典型增长与监管

就全球私立高等教育而言，非洲私立高等教育出现得相对较晚，且始于较低的毛入学率，所以埃塞俄比亚发展私立高等教育（1998 年）比非洲更晚，最开始的毛入学率很低，仅为 0.8%。埃塞俄比亚较晚启动私立高等教育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几十年压制性的马克思主义统治，这种统治紧随着 1974 年海勒·塞拉西皇帝（Emperor Haile Selassie）长期统治的结束而开始，禁止一切形式的私有制。然而，今天只有乌干达可能会在私立院校招生上与埃塞俄比亚相似。与此同时，厄立特里亚（1991 年从埃塞俄比亚脱离出来）仍然是非洲或世界上没有私立高等教育的少

数几个国家之一。

与大部分地区（私立高等教育的无计划出现和快速增长令政府惊讶）相比，埃塞俄比亚后马克思主义政府规划推动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快速增长。事实上，监管框架在私立教育部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主要是实行（而不是限制性的）监管。

虽然非洲国家在看到私立院校容易扩散的学术和其他弱点时，通常会公布“延期监管”，且对私营部门施加一些专门的规定，由此，埃塞俄比亚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走入了监管极端。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在法律和教师教育中封锁私立项目。虽然私立高等教育在埃塞俄比亚远程教育中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但其后来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也被暂时禁止。虽然宗教院校常在非洲私营部门开始，然后在那里茁壮成长，但在埃塞俄比亚，宗教性教育机构提供的宗教学位只有在宗教社会才被接受。它们不被国家承认，这是就业市场影响下的限制性政策；要被更广泛的接受，项目必须是非宗教的，并获得国家认证。

私立高等教育内部的非典型组成

那么，在埃塞俄比亚，宗教部门在私立高等教育中的份额比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要少得多，这一点并非偶然。埃塞俄比亚的宗教部门大多是非精英阶层也并非偶然。其中大部分不是重新创造的，而是从较低层次的、先前存在的学校中发展起来。相比之下，在许多非洲国家，宗教院校是最强大的学术力量之一。许多前殖民地在高等教育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天主教或新教根基，而埃塞俄比亚则从未被殖民化。那么，如果在埃塞俄比亚，宗教性的私立高等教育较为弱势的话，那么，谁才是主力呢？答案是营利性私立高

等教育。它在私立高等教育中占据绝大多数的份额。这不仅是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大多数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区别，这也是一个惊人的差异。不是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允许营利性院校的存在，且利润的出现常常涉及合法的非营利院校寻求方法来回避监管限制。此外，在那些营利性院校合法存在的国家，这些院校与许多非营利院校平起平坐。但埃塞俄比亚却不是这样。这么看来，在（小型）宗教部门以外，仅有的非营利性的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机构是几所非政府组织拥有的私立院校。在营利性机构中，大部分是私人有限公司，主要是家族企业。高等教育各层次都允许营利性机构的存在。

连续性 vs. 变革性

因此，面对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需求的巨大增长，推动性与限制性政策并行使私立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关键方面作用有限。国家现在面临的不仅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计划中的加速发展，那么，政策将如何演变呢？如据预计，未来五年总入学率将翻一番，私立部门在此过程中的份额将会不断增加，如何选择支持性或限制性管理私立高等教育的政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存在限制性的规定，埃塞俄比亚的私立部门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且有信心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埃塞俄比亚入学人数中占据更大份额。但是，并非所有的政府决策者都这样认为。

注：“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ROPHE）是《国际高等教育》的专栏。

乌干达：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需求

Mukwanason A. Hyuha

Budembe 公司经济学名誉教授、顾问

电子邮箱: hyuhama@gmail.com

在质量方面，仿造英式体系塑造的乌干达教育部门，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都是非洲最好的教育系统之一。此后，学术和实体基础设施的质量严重下降。像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乌干达的高等教育部门目前正面临各种挑战，除其他因素外，包括：整体资金不足、各级学术人员不足、高级人员严重短缺、学术人员的薪酬不足、研究生培训设施不足、治理问题严重、科研成果少、学生奖学金匮乏，授权部门对该部门的非理想监督。然而，主要的挑战还是资金不足。

乌干达的高等院校包括 36 所大学，4 所其他学位授予机构，以及各类证书和文凭授权机构。这些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只有 20 多万人，其中 45% 是女性。这些学生占全国小学、中学和高等院校全体学生的 2%。一般来说，穷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院校的大多数学生出身良好。这与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情况不同，这两种教育广泛接收来自富裕和贫穷家庭的学生，特别是鉴于目前实行的普及中小学教育（UPE 和 USE）计划，该计划在《2000 年 9 月联合国宣言》（*the UN Declaration of September 2000*）之后得以实施。此外，肯尼亚、卢旺达、索马里、南苏丹、坦桑尼亚等邻国的许多公民都在这些院校中学习。

高等教育需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乌干达的

高等教育部门在院校数量上继续保持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需求旺盛。商院校占主导地位（33%），其次是大学（16%）和技术学院（4%）。虽然马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是 1988 年以前在乌干达唯一获得颁授学位的机构，但目前在全国有 41 个学位颁发机构，其中 11 所是公立大学。

总的来说，至少在东非地区，人们对大学教育需求巨大。这一需求远远超过了对中等和技术教育的需求。这是广泛需求、大学密集的广告的结果，并且，比起证书和文凭持有人，就业市场更喜欢学位持有者。此外，较之于学习其他学科的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的学生拥有比早期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就业选择。因此，比起中等和技术教育，大多数学生、家长和决策者都更喜欢大学教育。这种偏见导致乌干达的中级技术人员和工人明显缺乏，乌干达不得不从国外引进这类人员。因此，到 2016 年，不到 10% 的健康科学及工程培训课程是文凭项目。毋庸置疑，如果要有技术劳工来吸引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乌干达需要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政策转变。

此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使用电脑以及在科学和技术的入学率也有所改善。然而，入学率的高涨仅存在于商业和计算机等相关学科，而不是在基础科学、数学或其他技术科学领域。除了在商业和计算机领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外，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还包括中学教学设施不足和资金缺乏。部分原因是由于近期关闭了技术研究所支持大学的发展，因此，技术院校的中级技术人员数量在不断下降。

较低级别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闭是一种倒退，因为中层技术人员和技工在所有的建设和维护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大部分增长是在商业学习领域，而非技术学院领域。

总体而言，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私立院校占比 72%，公立院校占比 28%。公立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由私人而非政府资助的。事实上，除了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所需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外，私营部门作为公立高等院校的资金来源之一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乌干达，私营部门在提供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补充性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教育质量

如上所述，乌干达的各级教育质量曾是东非最佳。优异的教育质量得到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设备齐全且资金充足的院校、适当的配套服务和教职人员以及各院校良好治理的支持。尽管 1971 年乌干达将军伊迪·阿明发动的政变（the Idi Amin coup d'état of 1971）带来了政治动荡，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至少在二十年内仍保持较高水平。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腐败，学生和老师的纪律和斗志都很高昂。不幸的是，现在腐败遍布全国。

如前所述，许多外国学生涌向乌干达中学寻求优质教育。紧随着 1992~1993 学年非政府资助学生入学，以及自 1988 年私立大学

成立以来，许多非乌干达人也涌入该国，期望能够获益于优质的大学教育。乌干达的高等教育花费通常比邻国便宜，这也有助于增加需求，从而增加外国学生流入该国的数量。

之后，情况变差，主要是由于资金严重不足。目前，除其他因素外，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资金不足、教室过多、教学人员数量不足（有时是缺少经验和资格不足）、教学资料不足、资深学者人数不足、极少的科研产出、管理和治理等其他方面上的欠缺。事实上，所有的大学目前都是“底端受重的”，严重缺乏资深教职人员，特别是在教授级别的人才。至于科研，基本上只有马克雷雷大学才能拥有合理的年度科研成果；其他大学本质上是教学型大学，研究成果极少。就实体和教育基础设施及学术水平而言，大多数院校有待提高，这与小学和中学的情况一样。

未来的路

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技术，乌干达需要立即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包括恢复和发展。最终，这涉及重塑高等教育，使其拥有新的面貌和内涵，包括改革院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这种改革最终将提高其质量和数量，强化现有系统和结构，弥补现有差距，发现并处理缺陷，从而加强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部门肯定需要全面改革。需要把对整个教育部门的政府年度预算拨款从目前的低水平（不到预算的 10%）提高到至少 15%。因此，增加资金、密切监管、重视应对其他挑战对于克服影响高等教育的多方面问题至关重要，同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应针对以上这些因素。

创建排名的挑战：以哥伦比亚为例

Felipe Montes、David Forero、Ricardo Salas、Roberto Zarama

Felipe Montes: 哥伦比亚洛斯安第斯大学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工业工程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 felmont@uniandes.edu.co

David Forero: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经济科学学院讲师

电子邮箱: davidfforerot@gmail.com

Ricardo Salas: 哥伦比亚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心 (Quality Assur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Office) 主任

电子邮箱: jssalas@gmail.com

Roberto Zarama: 哥伦比亚洛斯安第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rzarama@uniandes.edu.co

哥伦比亚有 4 800 万人口, 230 万学生入读高等教育 (49% 的入学率)。近二十年来, 哥伦比亚政府使用自愿认证制度向公众提供有关高等教育院校质量的信息。即使认证被认为是赋予公众对教育质量信任的工具, 但它并未为决策提供足够的信息, 因为公众只知道高等教育院校是否获得认证。公众并不知道院校的质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远离认证标准。此外, 只有 14% 的高等教育院校获得认证, 其余 86% 的院校大都选择退出。因此, 社区对于非认可院校的质量信息有限, 而这些院校的所占比重较大。社区咨询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国际排名。然而, 目前该地区最全面的学术排名, 即“QS 拉丁美洲排名” (QS Latin America), 仅包括 289 所哥伦比亚高等教育院校中的 50 所 (17%)。

作为哥伦比亚教育部的成员和顾问, 我们以多维度方法开发了一个排名: “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 (the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MIDE 是其

西班牙语首字母的缩写)。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信息, 使社区能够比较国家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表现, 并告知它们有关高等教育的决定。

本文介绍了由教育部长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发布的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在设计、实施和信息披露中遇到的五个主要挑战。我们还介绍了用于克服这些挑战的方法。

挑战 1: 信息来源与可靠性

创建学术排名最具挑战性的限制在于信息的可用性和稳健性。我们仅根据公共信息系统提供的已有数据建立了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 我们没有使用来自调查和声誉测量的指标, 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倾向于自我参照和自我维持。虽然哥伦比亚的数据来源是公开且免费的, 但人们难以接触并解读。因此, 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旨在提供一种简单的机制来读取和解释这些信息工具产生的数据。

我们使用的信息系统自 21 世纪初以来一直由政府开发，用于衡量高等教育院校在质量和相关性方面的表现。这些系统主要使用高等教育院校报告的信息。包括院校的人口和财务变量；基于社会经济指标的辍学率；校友就业能力和就业市场工资；科研指标；以及高等教育国家标准化考试结果等。

挑战 2：高等教育院校多样性

建立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将不同高等教育院校的绩效与常用指标进行比较。为了分割复杂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调整了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院校分类所使用的概念。根据每个教育级别的毕业生或课程数量以及本科课程提供的学科数量，我们将公立和私立院校合并为四组（博士、硕士、本科和专业院校）。该分类使我们在得到总体排名的同时还得出了每个组的排名。

挑战 3：变量和指标的选择

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基于对“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QS 权重系统”和“U-Multirank”多维度方法等不同要素的综合评估。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由六个维度的 18 个变量组成，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学生、教授和院校。我们考虑了投入和输出变量。投入变量作为该院校可用资源的指标，输出变量作为学习结果和劳动力市场成功的指标。在国际排名和国内认证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一些指标，在这些指标上的进展将带来高等教育院校的改善，

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与其他排名不同，它包含学习结果的客观测量指标，这基

于哥伦比亚国家考试 SABER PRO 的结果。自 2003 年以来，该考试每年对五个基本能力领域的高等教育毕业生进行评估，包括定量推理、批判性阅读、写作、英语理解、以及特定学科问题的模块。

挑战 4：排名方法

排名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组织结构，在一个单一的分数中总结一系列变量。为了对院校进行排名，我们设计了一种称为“对排名进行排名”的方法，作为一种确保每个变量具有相同规模和分布的技术。该方法包括：使用每个指标中的高等教育院校的位次，然后通过使用每个变量的权重来平均这一位次以得到最终成绩。这带来了为每个变量定义权重的挑战。虽然我们考虑了允许用户自由分配权重以使其能够创建自己的排名的选择，但对教育部来说，促进某些关键指标的提升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根据数据源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以及该指标在《国家发展规划》（*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高等教育目标中的重要性，为每个变量确定权重。

挑战 5：公开性

通常，排名模式由第三方开发。虽然这一模式是由教育部创建的，目的是提高质量和增强决策水平，但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教育部负责向高等教育院校提供资源，也因此部分地对其质量负有责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可以被看作是法官和陪审团。然而，挑选可用信息的结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并为院校敲响了警钟。以这种方式，我们向社会保证：1) 排名不会用于

其他目的，如为资源分配提供情报或制定认证过程的质量标准；2) 平衡模型指标以代表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3) 排名采用相关的现有客观测量标准进行设计，以实现其透明度，并因此具备可复制性。

展望

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且定于 2015 年 7 月发布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围绕高等教育质量的共同语言，并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进行了大量讨论。即使这种模式可能需要时间来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但它无疑为高等教育院校提供了有关如何提高质量的相关可靠信息，也为家长和家庭对高等教育做出知情决策提供了可靠信息。整个 2016 年，更新版的排名，即“高等教育绩效指标模型 2.0”得到了高等教育院校的广泛接受。

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助力经济增长

José Janguie Bezerra、Celso Niskier、Lioudmila Batourina

José Janguie Bezerra: 巴西高等教育保护者协会 (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Mantenedoras de Ensino Superior) 和巴西教育集团 (Grupo Ser Educacional) 主席

电子邮箱: janguie@sereducacional.com

Celso Niskier: 巴西高等教育保护者协会副主席、卡里奥卡中心大学 (the Centro Universit á rio Carioca) 校长

电子邮箱: cniskier@unicarioca.edu.br

Lioudmila Batourina: 巴西高等教育保护者协会国际合作顾问

电子邮箱: lioudmila@abmes.org.br

巴西私立教育部门的规模之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的教育需求如此之大，在政府的相关支持下，私立大学不断扩张。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界，大多数人认为私立教育是商业行为而非国家计划，其重点是质量。非营利性院校也通过各种课程和项目进行创造利润，关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教育的讨论没有终结。在巴西，与此同时，全国毕业生考试 (ENADE) 也揭示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不同质量，来自营利性院校学生的强大动机使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私立大学经常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大学的教职员工在联邦和州立院校工作，而主要来自低收入社会阶层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动机。

要认真考虑的办学力量

自 1996 年以来，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部每年都在巩固，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巴西的 2 364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87.5% 是私立的。这包括分布在巴西的 2 069 所大学、大学中心和学院，它们为巴西公民提供

获得学位（本科、硕士和博士）并改变自身处境和家庭情况的机会。

这个私营部门的实力得到了国家统计局数据的证明：今天，有超过 600 万学生入读私立高校，占有大学生的 75% 以上。在巴西的教育系统中，有着一定的社会转折；简而言之，在昂贵的私立高中学习的男女学生，经过最终考试，可以赢得联邦或州立大学数量有限的免费入学名额的竞争。另一方面，来自公立高中，但成绩较差的学生必须申请资助，以支付其在私营部门的高等教育。这基本上意味着私营部门肩负责任，即培养这些学生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教育水平以为国家服务，为此，它饱受诟病。

巴西的私营部门包括许多中小型高校和大型院校。约有 36% 的学生进入了 12 个最大的教育团体。不管其规模如何，所有高校都面临着多重挑战：维持质量标准、吸引最优秀的员工、保持灵活性、通过严格的认证审核、不断适应法规的诸多变化，包括资助在内的许多变化。

传统上，巴西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课程

涉及较少技术领域，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正被抹去，但这使得基础科学和技术要求最高的专业留在了公立大学之中。在私立高校提供的各种课程中，法律教育一直是学生中最受欢迎的，入学率最高（14%），其次是行政管理（9%），土木工程（6%），最后是医学院、教育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私立大学向国家提供合格的中产阶级工作者，他们是巴西劳动力市场及促进经济增长中最需要的人选。

增长曲线

巴西高等教育在 1996 年开始扩张。在此之前，入学率仍相当有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转折点在于引入了一个允许年轻人取得学生贷款的基金。因此，巴西私立教育部门的增长不应被误认为是私营企业发展的结果，因为这是“国家教育计划”（the National Education Plan）的自然结果。事实上，这是将巴西私立教育与欧洲国家私立教育区分开来的核心特征。巴西私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计划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一种工具以及一位提供者。它们是国家领导人和受过高等教育商人的共同创新解决方案，以解决国家高等教育院校数量不足以及社会融入问题。

第二次戏剧性的跳跃发生在 2002 年，当时引入了第一个技术性本科课程。这些课程的时限较短，促进了低收入社会阶层的学生、或是 C 和 D 类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组成了一半以上的巴西学生。这些课程在市场上被接受为高等教育，并且对高中毕业后工作多年才进入大学的成年学习者开放。

增长的下一个高峰期是 2005 年，当时设立了 ProUni 基金。该基金在私立高校中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奖学金颁了发

给那些所在家庭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 1.5 倍的学生。

2010 年，学生资助基金（the Student Financing Fund）的贷款重组，下调的利率和延长的分期偿还期限带来了入学人数的暴增，从 2010 年的 7.6 万人增加到 2014 年的 73.2 万人。

2015 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迫使巴西政府大幅度减少学生资助基金，大多数 C 和 D 类学生再次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目前，18~24 岁年龄层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刚刚超过 17%，而根据国家教育计划，到 2024 年，33% 的青年人口应该入读大学。从 1996 年到 2014 年，学生资助基金达成了目标的近 40%，但在 2015 年资金急剧缩减后，其在 2016 年资助了不到 15% 的学生。

对国家教育计划的偏离引发了巴西高等教育保护者协会最为强烈的反应，它代表了私立高校及其学生的合法利益以及整个教育计划。奖学金对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论点不过是一个辩论的陈词滥调：私立院校学生（占高等教育部门的 87.5%）生均支出低于公立院校的学生，而他们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为应对在 2024 年之前实现国家教育计划目标的挑战，巴西高等教育保护者协会的战略重点是敦促政府继续投资于奖学金。同时，鉴于目前的经济危机，该协会正在与当局合作，寻找替代性资助机制，例如，可能出台的允许私有银行进入潜在学生资助市场的新规定。

经历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后，私立教育部门是政府在寻求为社会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和维持经济增长方面最佳且最积极的合作伙伴。

东亚高等教育区域化

Edward W. Choi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edward.choi.2@bc.edu

三大著名组织成为东亚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驱动力: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the South 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以及最近形成的中、日、韩政府间的三边组织。虽然这些区域行为者有一定的合作历史, 部分原因是希望建立一个共同的东亚高等教育空间, 但它们主要根据不同的需求、目标、时间表和习俗实施区域化计划。这种现象导致了东亚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碎片化格局。在考虑这种情况时, 出现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东亚有多个区域化计划? 对于具有多个区域会员身份的国家, 某些区域化计划是否可能优先于其他计划? 如果是的话, 作为独立计划, 以及在更广泛的层次上作为建设共同东亚高等教育空间的计划, 东亚区域化计划是否受到不良影响?

东盟及东盟大学网络

最初(大约在 1967~1989 年间), 东盟推动了在政治稳定与安全的双重前提下的合作。因此, 其创始成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共同的任务重点是遏制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和合作建国, 特别是在该地区成功的民族独立运动之后的几年。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事件, 特别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促成了理性转变, 因为围绕经济一体化的政治话语浪潮

席卷了该地区。金融危机凸显了合作需求, 不仅需要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还要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受影响的国家之间开展合作, 以寻求经济解决方案, 防止未来的经济衰退破坏该地区。这组国家被称为“东盟+3”。

在东盟的演变过程中, 从东南亚国家的独有分组到包容性的“东盟+3”组合, 再到后来的“东盟+6”组合(新加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 围绕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进行政策对话缓慢实现。谈话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前两次东盟教育委员会(ASEAN Committee on Education)会议; 这些会议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 特别是激发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潜力, 以作为推动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会议还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 赞成国际人才管道, 以获得合格和高积极性的学生。这带来了一个叫做东盟大学网络(th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的次区域分组, 它获得了东盟大学网络质量保证(th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Quality Assurance)框架和东盟学分互换系统(ACTS)的帮助, 推动了 30 所成员院校中教师、员工和学生的交流。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和东南亚高等教育区

鉴于东盟的东盟大学网络在次区域平台上运作,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区域高等教育和发展研究中心(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力求实现建立一个东南亚高等教育区 (South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的高层次目标。迄今为止, 三项主要的区域化进程已经推进了这项工作: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流动试点项目, 以及东盟质量保证网络 (the ASEAN Quality Assurance Network) 和东南亚学分互换系统 (the Southeast Asi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两个区域协调机制。在亚洲大学流动 (the 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及亚太学分互换系统 (the Pacific Credit Transfer System) 的帮助下,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 23 所大学在该计划的首个四年计划期间 (2010~2014) 促成了 1 130 名本科生的交流。现在,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正在以更具包容性的品牌推进, 如东盟学生国际流动 (the ASEA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or Students) 项目, 并计划将其扩大到另外的四个国家: 文莱达鲁萨兰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相反, 东盟质量保证网络和东南亚学分互换系统活动难以测量; 但是, 这两个区域机制在东盟学生国际流动项目下被更多人所知。

“亚洲校园计划”

东亚区域合作的最新进展是一项三边学生流动计划, 称为“亚洲大学学生交流集体行动计划”, 简称“亚洲校园计划” (the Collective Action for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sia)。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指导下, 2012 年, 亚洲校园计划推出试点项目, 通过学分互换, 双学位和联合学位课程, 促进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流动, 并旨在通过共享资源和知识平台, 培养一批有才华的“亚洲专家”。这些专家可能将成为东北

亚地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知识型大使。也许还有第二个目标, 流动计划可能被认为是缓解中国和韩国的人才流失问题 (知识资本流失到北美和欧洲等受欢迎的学习和工作目的地) 的方法之一, 同时促进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国际需求, 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入学率下降的前景 (日本和韩国)。

东亚区域化的难题

单独来看, 上述所有区域化计划都有可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带来相当大的益处: 不断深化的跨文化理解, 知识共享, 技能型劳动力的国际供应系统, 以及区域稳定与和平。然而, 从整体来看, 它们代表了区域化的破碎化格局, 包括相互排斥,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重叠的跨区域和区域间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关系。这些不协调的动态势必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因为区域网络很可能参与政治操控和其他装腔作势的行为, 特别是随着计划扩展到邻国领土, 并努力招募已致力于其他计划的成员国。

例如, 东北亚三国集团计划在“亚洲校园计划”中纳入一些东盟和/或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成员国, 东盟和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已考虑将东盟大学网络和东盟学生国际流动项目分别扩展到东北亚 (即日本、中国和韩国) 的可能性。随着新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逐渐清晰, 拥有多个会员身份的国家可能会选择认可或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合作, 无论这些合作是产生最大收益 (例如, 在声望、政治认可或资源方面), 或是最为可行,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东盟 10+1”合作机制的日益成熟 (例如东盟—日本) ——或许以牺牲“东盟 10+3”集团的发展为代价, 可能会说明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 区域网络可能会发现正变得“四处分布”的资源,

因为成员国将资金、人力和时间用于多个区域化举措。总而言之，优先化活动可能阻碍了持续的区域合作关系的发展，限制了共用多个成员国的区域化计划的进程。此外，一个包容各方、单一的东亚和平社区的建立也处于危险之中。

东亚区域组织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试图协调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地理区域的文化、语言、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国家规范和法规，特别是潜在协议和资历。诸如东盟质量保证网络，亚太学分互换系统和东盟学分互换系统等已弱化了最明显的差异，并成功地促进了精英区域集团的学生交流，如东盟大学网络和试点国际流动项目。但是，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旨在使整个东亚的教育收益平衡协调机制。认识到这一限制，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区域高等教育和发展研究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已开始开发旨在成为包容各方的泛东亚参考工具

——被称为学术学分互换框架（the Academic Credit Transfer Framework）。不过，问题在于，东亚共存的许多区域网络是否会涵盖这一框架，特别是考虑到它们倾向于促进本国流动计划和协调各自次区域的原生机制。目前，亚洲校园计划似乎正在探索自己的学分互换系统和质量保证框架，而东盟大学网络，如前所述，正使用东盟大学网络质量保证框架和东盟学分互换系统。

鉴于目前的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是强调东亚区域网络间更高水平区域间合作的良好时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缓和当今东亚区域化特征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开发有效方法以在区域网络间共享知识和资源，从而平衡整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益处。也许，以这种方式，东亚区域化将迈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化议程，创建一个单一的泛东亚高等教育社区。

中国：世界毕业率领跑者

Julian Marioulas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University of Vienna) 东亚研究系博士生、中国华东理工大学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外国语学院教师

电子邮箱: julian@marioulas.de

《经济观察家》(*the Economic Observer*) 在 2013 年 4 月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大学是否太容易了？”虽然这一问题可能在许多高等教育体系中被问及，但《经济观察家》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肯定答复是清晰且响亮的。中国是世界上辍学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来自教育部的消息表明，未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人数不到 1%。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罕见事件引发了受影响个人及其家属的抗议。东亚高等教育总体来说具有入学要求高、辍学率低的特点，但韩国与日本的辍学率仍然在 10% 左右，与中国的辍学率相差甚远。在中国，无法从大学毕业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从数字看

作为本文数据收集的一部分，使用在中国大陆的高校出版的《本科教育质量报告》(*Quality Reports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我列出了 187 所大学及其四年制毕业率和毕业时的本科学位授予率。名单上的大学组合多种多样，包括十二个省份，农村和城市社区以及各种质量和规模的院校。2013 年，四年制本科平均毕业率达到 97.3%。五所院校的学生毕业率高达 100%，而最低的毕业率为 84%。同年度学士学位授予率为 96%，低于总毕业率。通常，毕业证书需要所有必修课程及格，且满足规定的学分要求，而学士学位可能需要达到某一绩点要求。

一所大学的质量和排名似乎对此并无影响，因为“211 项目”国家重点大学的毕业率与省级大学相比差别不大，而这些学校的入学要求要高于省级大学。略有差异的方面似乎是地理位置，河北省，近几年来大部分学院升格为大学，平均毕业率达 98.8%，而上海则下降到 95.9%。一些学校拥有与外国合作院校共同管理的院系，这些院系往往难以毕业，平均毕业率略高于 90%。

确保毕业

在中文杂志《时代教育》中，江苏理工大学的两位讲师撰写了文章，这是一所入学要求相对较低的省级院校，他们提出了几项有助于按时毕业的对策：降低补考的难度，增加学生在后一学期或是毕业前重考的机会。另一个促成因素是教师能力的普遍缺乏，以及如果学生不通过考试，他们不愿意接受更大的工作量。这对就读于较不具竞争力院校学生的影响可能是有害的。在课堂上，许多学生在玩手机，读小说，或是睡觉。课外的学习集中在考试周以及与课程考试相关的资料上，如果学生认为多次考试失败也不会受到惩罚的话，以上的课外学习也是被忽视的。近年来唯一关于毕业率研究的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河北省燕山大学李子峰及同事认为，大多数大学毕业率接近百分之百，学生作弊不受谴责，老师选择让每个人

通过考试以避免引起麻烦。学生没有被“培养”来履行理论上要求的职责。作者将这些事实与西方大学进行了对比，西方大学的要求更加灵活，而且要求更高，作者猜测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质量。

《工人日报》(*the Workers' Daily*) 2013年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海南一所大学的案例，在该校，教师得到指示要让所有本科生毕业，无论他们是否通过课程考试。这也适用于硕士生，只要他们的论文通过剽窃软件的检测，都予以毕业。学术行政人员选择维持高毕业率，以保持积极的形象并确保未来的资金来源，防止低绩效部门被逐步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让每个人“过关”的设置似乎是教师们所欢迎的。

一些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大学入学人数大幅上升，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提高了内地教育机构的质量和认可度。但我认为，毕业几乎都得到保证是中国高校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就这样，精英大学通过高考（大学入学考试）和自主招生招收了大部分学生。虽然后一种方法使大学在招生上更为灵活，不依赖于一个单一的判断分数，但也容易出现腐败。近几年最受关注的是蔡荣生事件。在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室任职八年间，他为特殊学生“开后门”，受贿金额超过了2 300万元人民币（约合340万美元）。据《北京晨报》(*the Beijing Morning Post*) 报道，知名大

学的入学名额定价可以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约15万美元）。自主招生已成为“有关系”的不合格高中毕业生进入知名大学的渠道，在这些大学，无论他们的努力程度如何，他们都会毕业。在这种情况下，在四年制学位课程期间淘汰成绩较差学生的评估制度是不可能实施的。

至少在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自蔡荣生事件以来就已大幅缩减。据招生办公室统计，2016年，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了192名学生（同期共有2 797名新生），这远远低于2012年的550人，当时约占同期入学新生的20%。

鉴于拥有大量合格人选，这些大学可以在目前的水平上达到较高的毕业率，而无需为此目的进行任何特定的调整，这一点似乎是可想而知的。这要以一个透明的、择优录取且没有腐败的入学程序为前提。

就省级大学和学院而言，我认为它们将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严格的毕业要求。到目前为止，入学率和入学专业数字增长的推动力恰好与毕业率保持高位的任务相一致，与实际的学生表现无关。在诸多省级大学进行模式转变，严格重视毕业生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有助于提高学位的含金量并缓解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特征的等级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个新成立的大学突破了已有招生和课程要求的既定模式，包括上海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它们的毕业情况是否与绝大多数院校不同，或是与其绝对相符，这还有待观察。

革命后伊朗的政治与大学

Saeid Golkar

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中东和北非课程讲师

电子邮箱: aeid.golkar@northwestern.edu

1979 年革命后, 伊朗高等教育的轨迹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 在革命时代(1979~1987 年), 在文化革命和伊朗与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1980~1988 年), 伊朗高等教育经历了第一波伊斯兰化。接下来是 1998~2004 年间的重建和政治发展时期。在此期间, 政权从意识形态压力中释放了大学, 使它们越来越独立于国家。第三个时期是“硬派时代”(2005~2012 年), 大学又经历了另一轮伊斯兰化与再中心化。

革命和战争期间的高等教育

伊朗大学享有短暂的自治权, 因为巴列维君主制结束了, 但在革命中它们作为政治热点的角色很快带来了政府的控制。紧随 1979 年伊朗革命, 政府官员实施了旨在规范和“净化”大学的政策, 以清除大学中有关巴列维政权的任何痕迹。

根据“文革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lan) 计划, 大学自治受到侵蚀。在 1982 年前, 所有大学都关闭了三年, 以此“清洗”政治和宗教性的反抗。在此期间, 文化大革命总部是管理和指导伊斯兰化项目的主体。理事会强调了伊斯兰化大学的两个阶段。首先, 它通过清除任何西方或东方影响的院校, 设置了一个亲伊斯兰教课程。在第二阶段, 它涉及了新建伊斯兰化大学的实体建设: 院校的各个方面都要进行修正, 以反映伊斯兰原则和标准。诸如最高文化革命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等多个组织建立起来, 以监督和管理大学的伊斯兰化项目, 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伊朗文化之中。

建设与改革时代 (1989~2004)

伊朗伊拉克战争后掌权的哈什米·拉夫桑贾尼 (Hashemi Rafsanjani) 的技术官僚政府认为, 大学是培养国家官僚机构官员的主要途径。第一次文革后占主导地位拉夫桑贾尼政府更加强调技术专长 (takhasoos) 而非意识形态承诺 (takhasoos)。拉夫桑贾尼的实用主义导致伊朗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那时, 许多私立大学在全国各地成立。国立大学的入学率从 1988 年的 407 693 人增加到 1996 年的 1 192 329 人。

在哈塔米 (Khatami) 的改革主义行政管理 (1997~2004 年) 中, 这种趋势得以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 大学自治增加和政治气氛更为宽松。哈塔米政府试图重组高等教育制度, 并更加独立于政府。2000 年, 文化和高等教育部改为“科学、研究和技术部”, 突出了其管理范围涵盖科研和教育。第二年, 大学在编写课程和大纲时更加独立。此外, 在 2002 年, 大学被允许聘请教授而不是接受国家任命。最后, 大学被允许通过选举过程来选择其管理人员, 包括院长和校长。

正如在拉夫桑贾尼时代一样, 哈塔米时代学生入学率迅速增加, 从 2000 年的 1 404

880 人增加到 2004 年的 2 117 471 人。大学的女学生人数也稳步上升。在学生自身的支持下，改革派开放了大学的政治辩论，鼓励学生的政治参与，这是受保守派袭击的政策。学生政治自由的扩大带来了其挑战政治制度非选举团体的强烈民主愿望，这表现在 1999 年和 2003 年被民兵和其他警察团体镇压的学生起义。

尽管国家官僚机构努力实施改革政策，但却受到伊朗最高领袖和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试图阻止改革方案，阻挠学生运动，继续伊斯兰化大学。1997 年，由保守派主导并由最高领导人任命的最高文化革命委员会支持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化教育机构理事会（Council for Islamiz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s）。该理事会于 1998 年 12 月批准了许多法规，包括题为伊斯兰大学原则（Principles of Islamic Universities）的正式声明。根据这份文件，大学的伊斯兰化将通过六个不同的渠道实现：教授、学生、课程与大纲、文化节目、教育编程和学校管理。被改革派拒绝的政策是在下列强硬管理下执行的。

强硬派时代（2005~2012）

一个独裁的民粹主义者——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同时扩大了高等教育并对大学加强政治控制。到 2013 年，学生人数达到 400 万人。同时，他的政府撤销了大学的相对自主权，把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再中心化，使大学受到政治控制。在此期间，政府控制大学的力度急剧增强。以硬派学者为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实施了所有伊斯兰化教育机构理事会的法规，旨在进一步推动大学的伊斯兰化。

高等教育制度的再中心化发生在几个层级。在管理层面，科学、研究和技术部，而不是院系，选出大学校长。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将许多受人尊敬的学术人员替换为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深信大学的伊斯兰化。科学、研究和技术部还替换了已经实施了 18 年的大学管理规定，其任务是大学校长将选择执行大学伊斯兰化的代表和院长。积极实施性别隔离政策，并要求大学扩大道德监督，并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神学院。

2007 年，为了招收亲政府留学生，政府在招聘过程中取消了大学的自主权，招募了思想驱动的讲师。在艾哈迈迪内贾德当政期间，学生入学同样集中，入学博士生受到科学、研究和技术部的控制。这种控制有助于政府阻止政治活跃学生继续接受教育，并增加亲政府学生进入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大学也失去了设计和准备课程的自主权。人文科学教科书促进委员会成立，旨在“净化”大学教科书。许多观察家将这些努力解读为第二次文化革命，这削弱了伊朗高等教育的质量。

结语

控制和伊斯兰化大学一直是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关注重点之一。这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1 世纪的两度文化大革命。这些政策导致了大量的人才流失并削弱了教育质量，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国家在创建伊斯兰大学方面仍未成功。大学和学生人数的增加，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部分政治精英的碎片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是伊朗大学伊斯兰化失败的原因。

新书速递

- Arar, Khalid, and Kussai HajYehia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Palestinian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13 pp. \$100 (hb). Website: www.palgrave.com.
- Bader, John. *Dean's List: 10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ucces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7. 216 pp. \$24.95 (pb). Website: www.press.jhu.edu.
- Barrett, Beverly. *Globalization and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 Europ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314 pp. \$99.99 (hb). Website: <http://www.palgrave.com>.
- Cramer, Sharon F. *Shared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Demands, Transitions, Transformations, Volume 1*.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7. 273 pp. \$85 (hb). Website: www.sunypress.edu.
- Cochrane, Sharlene Voogd, Meenakshi Chhabra, Marjorie A. Jones, and Deborah Spragg, Eds.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and Refle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romising Practices from the Cultural Literacy Curriculum Institute*. Abington, UK: Routledge, 2017. 126 pp. £44.00 (hb). Website: www.routledge.com.
- Cottom, Tressie McMillan. *Lower Ed: The Troubling Rise of For-Profit Colleges in the New Economy*. The New Press, 2017. 240 pp. \$26.95 (hc). Website: <http://thenewpress.com>.
- Diner, Steven J. *Universities and Their Cities: Urban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2 pp. \$44.95 (hb). Website: www.press.jhu.edu.
- Farrugia, Christine A. *Open Doors 2015: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 N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6. \$79.95. Website: <http://www.iie-books.org/opdoreonined.html>.
- Kim, Eunyoung, and Katherine C. Aquino, Eds. *Disability as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Policies and Practices to Enhance Student Success*. Abington, UK: Routledge, 2017. 244 pp. £29.59 (pb). Website: www.routledge.com.
- Knight, Jane, and Emnet Tadesse Woldegiorgis, Eds. *Regionalization of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7. 269 pp. \$54.00 (pb). Website: <https://www.sensepublishers.com>.
- Larsen, Marianne A.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through Spatial, Network, and Mobilities Theorie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96 pp. £100.00 (hb). Website: <http://www.palgrave.com>.
- Marber, Peter, and Daniel Araya, Eds. *The*

Evolution of Liberal Arts in the Global Age.
Abington, UK: Routledge, 2017. 242 pp.
£25.59 (pb). Website: www.routledge.com.

Musselin, Christine. La Grande Course des
Universités. Paris, FR: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7. 304 pp. 19 (pb). Website:
[http://www.pressesdescienc-
espo.fr](http://www.pressesdescienc-espo.fr).

Shek, Daniel T. L., and Robert Hollister, Ed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283 pp. \$119
(hb). Website: www.springer.com.

编者注：《国际高等教育》不再出版书籍的简短摘要，而是提供更全面的新书列表，这些书籍均是高等教育读者所感兴趣的。我们欢迎读者提供有关高等教育书籍的建议，特别是针对在美国和英国以外出版的书籍。此列表由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生助理 Edward Choi 编制。

